

# “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下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的实践路径探析

江元鑫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模式创新，其核心目标之一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为支撑，结合国内部分地区“大思政课”实践案例，分析当前协同育人格局下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的现状与挑战，从主体协同、内容整合、场景创新、保障机制四个维度，提出“四维联动”的实践路径，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力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实践路径

**DOI：**10.64216/3080-1486.26.01.076

## 引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sup>[1]</sup>这明确了“大思政课”的核心要求，即需打破单一课堂边界、整合多元育人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教育，其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引导受教育者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sup>[2]</sup>。在“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引领并非简单的形式化，而是通过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联动，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

当前，国内多地已开展“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探索，但实践中仍存在意识形态引领碎片化和表面化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以实际案例为切入点，探析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的具体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1 核心概念与理论支撑

### 1.1 核心概念界定

#### 1.1.1 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

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整合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形成目标一致、资源互补、责任共担的育人合力。

#### 1.1.2 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

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意识形态教育

贯穿于教学、实践、管理等各环节，通过理论阐释、价值引导、实践体验，使受教育者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1.2 理论支撑

#### 1.2.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3]</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的本质，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理论为本文提供了根本遵循。

#### 1.2.2 协同治理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提出，“强调多元主体通过沟通、协商、合作，实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sup>[4]</sup>在“大思政课”背景下，协同治理理论要求政府、家庭、学校、社会打破权责壁垒，通过资源整合、功能互补，解决意识形态教育“单打独斗”的问题，为路径设计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 2 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下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引领的现状与挑战

### 2.1 现状：协同基础初显，但意识形态引领存在“三重失衡”

#### 2.1.1 主体权责失衡：以学校教育为主，其他主体参与度不足

学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阵地，但政府、社会、家庭的协同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以某中学为例，该校虽与当地红色纪念馆签订“思政实践基地”协议，但政府未出台专项经费支持纪念馆开发意识形态教育课程，导

致纪念馆仅能提供基础参观服务,无法深入阐释红色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同时,学校未开展家长意识形态教育指导,大部分家长认为“意识形态教育是学校的事”,导致家庭层面的价值观引导出现断层。

2.1.2 内容深浅失衡:“口号化”严重,理论阐释不足  
部分“大思政课”实践中,意识形态内容停留在表面,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阐释,导致意识形态教育与学科逻辑脱节,难以形成价值认同。

2.1.3 场景内外失衡:课堂显性教育强,课外隐性教育弱

意识形态教育需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协同发力,但当前实践中存在只重视课堂教学的问题,忽视了课外的社会实践活动。据教育部2023年“大思政课”建设调研数据显示,<sup>[5]</sup>85%的高校思政课理论教学能覆盖意识形态核心内容,但仅30%的高校建立了“课堂—校园—社会”联动的意识形态实践体系;部分中小学虽开展红色研学活动,但多以打卡参观为主,未设计“体验—思考—认同”的实践链条,无法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浸润。

## 2.2 挑战:协同壁垒导致意识形态引领“力不从心”

2.2.1 权责边界模糊,意识形态责任分散化

“四方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角色定位不清晰。在政府部门中,教育部门负责学校思想政治课建设,宣传部门负责社会意识形态引导,但两者缺乏协同机制,导致资源对接不畅;社会机构缺乏参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动力,认为这是政府和学校的事;家庭则因缺乏专业指导,难以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最终导致意识形态责任分散。

2.2.2 资源整合不足,意识形态内容碎片化

不同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缺乏统一规划,导致意识形态内容出现重复或断层;同时,社会资源未与学校意识形态教育内容衔接,导致受教育者在不同场景中接触的意识形态内容碎片化,难以形成系统认知。

2.2.3 评估机制缺失,意识形态效果难以衡量

当前“大思政课”协同育人评估多侧重开展活动的数量,而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效果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导致意识形态教育重形式而轻实效,无法及时调整优化。

## 3 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下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

### 3.1 主体协同:构建四方主体责任体系,明确意识形态教育权责

3.1.1 政府:发挥牵头统筹作用,搭建协同平台

政府应成立“大思政课”意识形态教育领导小组,统筹教育、宣传、文旅等部门资源,制定专项规划。如,浙江省杭州市出台《“大思政课”协同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sup>[6]</sup>明确教育部门负责学校意识形态课程

建设,宣传部门负责社会思政资源审核,文旅部门负责红色场馆意识形态教育课程开发,并设立1亿元专项经费,用于资源整合与师资培训。

3.1.2 学校:发挥核心阵地作用,强化意识形态教学

学校需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思政课+课程思政”体系。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另一方面,推动课程思政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度融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3.1.3 社会与家庭:发挥延伸补充作用,营造意识形态浓厚氛围

社会层面,社会机构需开发标准化意识形态教育资源。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当地红色场馆联合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发了“沉浸式红色教育课程”,<sup>[7]</sup>通过角色扮演和理论讲解,引导受教育者从体验到认同。

家庭层面,可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家长能够上传家庭思政活动照片、视频,学校定期评选红色家风家庭,激发家庭参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

### 3.2 内容整合:构建阶梯式意识形态内容体系,避免碎片化

3.2.1 小学阶段:侧重感性认知,培养意识形态情感认同

可通过绘本、动画、红色故事等形式,传递爱国情感。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红色绘本系列》,以“小英雄雨来”“王二小”等故事,<sup>[8]</sup>引导小学生感知革命先烈的爱国精神;还可以开展红领巾讲解员活动,组织小学生走进社区,讲述红色故事,在实践中强化情感认同。

3.2.2 中学阶段:侧重理性理解,深化意识形态理论认知

在“道德与法治”与“历史”课程中,可结合历史事实阐释意识形态理论。例如,中学历史教师在讲授“改革开放”内容中,可以通过讲解深圳从小渔村到国际化都市的变迁,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3.2.3 大学阶段:侧重深入研究,强化意识形态理论自信

通过思政课、学术研讨、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引导大学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校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修班,组织学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结合现实议题,撰写研究报告;同时,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思政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可赴革命老区开展红色文化调研,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研究红色文化对当地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认同的统一。

### 3.3 场景创新：打通课堂—校园—社会—家庭场景壁垒，实现显性引领与隐性引领的统一

#### 3.3.1 课堂场景：推行互动式教学，强化意识形态显性引领

思政课教师可采用案例教学，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可以通过开展思政课的一系列比赛，引导学生在竞赛中深化意识形态认知；在数字化时代下，还可利用VR技术，让学生沉浸式体验典型历史场景，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感染力。

#### 3.3.2 校园场景：打造意识形态文化阵地，实现隐性引领

学校可通过校园环境建设、文化活动，营造意识形态教育氛围。可打造马克思主义文化长廊，展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名言警句、生平事迹；可开展红色主题征文活动，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校园文化生活，实现潜移默化的引领效果。

#### 3.3.3 社会与家庭场景：延伸社会实践链条，强化意识形态行为认同

社会层面，可以通过建立思政实践基地，设计“体验—思考—行动”的实践链条。可以通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引导学生参加环境整治活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意识形态从认知到行动的转化。

家庭层面，可开展家校共育实践活动。如北京市某中学组织“家庭红色研学”活动，家长与学生共同参观革命纪念馆，撰写研学感悟，并在学校举办的家庭研学分享会上交流。

### 3.4 保障支撑：构建制度和技术的保障机制，确保意识形态教育实效

#### 3.4.1 制度保障：完善协同机制与评估体系

一方面，由政府牵头，每季度召开会议，通报意识形态教育进展，解决资源对接、责任落实中的问题。

另一方面，可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设置指标，认知层面可以通过问卷、考试形式考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程度，情感层面通过访谈考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行为层面考查参与思政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次数；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确保评估结果客观公正。

#### 3.4.2 技术保障：搭建“智慧思政”<sup>[9]</sup>平台，实现动态追踪

开发“智慧思政”<sup>[9]</sup>大数据平台，整合“四方主体”的育人数据。如学生参与思政课、实践活动的记录，家长参与家庭思政活动的情况，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等；平台可通过数据分析，生成意识形态教育个性化报告；

平台可设置意识形态教育预警功能，若某地区、某学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参与率低、效果差，及时向相关主体发出预警，督促改进。

## 4 结论与展望

在“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下，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打破主体壁垒、整合资源、创新场景、完善保障。本文提出的“四维联动”实践路径，通过明确四方主体权责、构建“阶梯式”内容体系、打通“全场景”育人链条、建立“双轨”保障机制，可有效解决当前意识形态教育碎片化、表面化的问题，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实践的深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引领还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思政”“元宇宙思政”<sup>[10]</sup>等新形式，可利用AI技术开发个性化意识形态教育课程，利用元宇宙技术构建虚拟红色场景，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还能够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外意识形态教育的有益经验，但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确保意识形态教育的正确方向，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02 (01).
- [2] 陈万柏, 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 [3]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4]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2023年“大思政课”建设调研报告[R]. 2023.
- [6] 杭州市教育局. 《杭州市“大思政课”协同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Z]. 2023.
- [7] 延安市教育局, 延安革命纪念馆. 沉浸式红色教育课程开发与实践报告[R]. 2022.
- [8] 人民教育出版社. 红色绘本系列[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1.
- [9] 郑永廷.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10] 冯刚.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